

居延簡研究的早期階段

[英] 魯惟一

大約是在 1957 年，作為一名較為年輕而又沒什麼經驗的研究者，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居延出土的木簡，而直接引起我研究居延簡興趣的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在我研究秦、漢兩個朝代的歷史時，我發現傳世的《史記》和《漢書》在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許多訛誤，使我感到有必要查看一些真正出自漢代的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其次，在我研究爵制設立的目的和意義時，曾有朋友——好像是劉殿爵——建議我可以從居延或敦煌出土的漢簡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由於我在倫敦工作，可以有條件看到來自敦煌的簡牘。這些敦煌簡牘是五六十年前被探險家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爵士帶到英國的，可在大英博物館內研究。更加幸運的是，博物館還出版了配有簡牘照片及釋文和注解的兩部書〔1〕。這兩部書都是用法語寫的，一部是由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於 1913 年完成，一部是由馬伯樂 (Henri Maspero) 於 1953 年完成。而除了上述兩大學者之外，我可能是唯一一位曾要求看看大英博物館所藏簡牘文獻實物的人。就是從那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讀了王國維和羅振玉二人的著作。他們的著作中也有斯坦因在他首次探險中所發現的簡牘的照片，並且書中依據簡牘的形制與內容首次排出了敦煌簡牘文本的編次〔2〕。

我對居延簡的初步認識得益於勞榦所著的那套《居延漢簡考釋》，這套考釋是他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完成的。當日本軍隊在中國猖獗之時，勞榦在重慶工作，那裏是中國政府的所在地。勞榦特別值得令人敬佩，因為他的著作完成於戰時惡劣的環境

〔1〕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馬伯樂 (Henri Maspero)：《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倫敦，大英博物館董事會，1953 年。

〔2〕王國維、羅振玉著：《流沙墜簡》，1914 年。

中，當時可能連基本的照明都無法保證。然而，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沒有實物照片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和考證之部使用起來並不容易：石印的手寫稿對於理解簡牘殘片的書寫格式或是它們的編聯方式，都沒有給出什麼指導性的幫助。倫敦的同事和老師告誡我，說我在簡牘研究方面缺乏足夠的經驗，我對此很少感到詫異。

然而，有一個機會，使我於 1960 年 9 月來到了京都大學，在那兒花了一年的時間，專門從事學習和研究，而且沒有任何的教學任務，這個機會很快再次燃起了我的研究興趣。我很快得知，人文科學研究所每周都舉辦一次學術研讀班，每次都會有六七位日本學者一起會讀居延簡，並對居延簡的意義做出解釋。這些居延漢簡研讀班自然都是用日語進行的，每當我慶幸自己能夠聽懂其中若干談論時，卻還是有大量的內容被錯過了。討論會通常從下午 2 點開始，持續到晚上 9 點纔結束。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纔學會效法我的日本同事帶上便當來參會，或是利用我們中場休息的半個小時吃吃外賣。鼓勵我做居延簡研究工作的也正是這些日本同事，我尤其要感謝的是森鹿三、藤枝晃、大庭脩、米田賢次郎及永田英正幾位先生，感謝他們給了我極大幫助，感謝他們在理解簡文的目的是及意義方面所提出的真知灼見。實際上，他們已經能夠發表一些研究成果。在那個時候，我們都特別遺憾不能與中國的學者一起切磋——他們也一定與我們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從事着這一研究。

我們研讀班手頭所擁有的材料比起我在倫敦、在勞榦相繼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和考證之部裏所見到的材料都要完善得多。這些材料裏包括一整套勞榦在臺北出版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以及他新出的《居延漢簡考釋》，這個考釋本是勞榦對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及《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兩書的修訂本。我們的研究也得益於《居延漢簡甲編》，這是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於 1959 年出版的，書中印有 2 500 多枚簡牘及殘片的圖版。

勞榦所出版的圖版與中國科學院所出版的圖版之間，在圖版的編次方面存在着一個較大、較重要的差別。勞榦的三部書中，圖版的編次通常是較隨意的。考古學家一般發現簡牘後，就會將其成捆打包，故所有簡的圖版上也都相應地附有其包裝的編號，及其各枚簡編聯的序號，如“136. 39”，是指包號為 136 的第 39 支簡。所以，除了個別的差錯或偶然的因素外，很顯然可以判斷出，凡是包號相同的簡都源於同一地點、同一批簡。在勞榦出版的圖版中，有時會將由於存放於同一包中、因而源於相同地點的簡牘的圖版編在一起。但是，多數情況下，勞榦的圖版並沒有據此來編聯。而中國科學院所出版的《甲編》中，對於簡牘圖版的編聯更為細緻謹慎，比如，凡是第 311 號包中的簡幾乎都被編聯在同一簡冊中。此外，《甲編》還附有簡牘主要出土地點的重要信息，例如破城子，但沒有更詳細的出土位置。

居延漢簡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於 1927—1934 年在中國進行考察時發掘的，雖然當時的考古學家發表了一些報告，但書中沒有包含我們想知道的信息。參加居延漢簡講讀班的一些日本學者中，有的可能已經走訪了中國的許多地區，但據我所知，其中卻沒有一位遠達過敦煌或居延地區。

所以，我們一頁一頁地仔細翻看圖版，憑藉着勞榦的《居延漢簡》三部書來做簡牘研究，因為他的書裏所包含的要比《甲編》裏所包含的多。此外，我還利用自己幾乎所有的時間來獨立地研究資料。這裏應讀的著作就有很多，例如有陳槃、陳夢家、陳邦懷、馬衡等諸位先生的著作，當然也包括勞榦先生的著作，還有日本的伊藤道治、川勝義雄、西嶋定生、森鹿三以及藤枝晃等先生的著作。通過對簡牘圖版的研究，我自己發現了其中大量的問題，比如有若干兩支以上的簡以完全同樣的方式排列着，有些簡牘的文字書寫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些簡牘的內容完全屬於同一類型，諸如對吏卒或其家屬所配給的穀物或食鹽的數量等。這使我斷出這些簡牘可能出於一種而且就是相同的一份文書。之後不久，我便論證了 1 000 多枚簡牘分屬於 43 件不同的文書。用兩套勞榦的圖版，就能將每一支簡或者殘片的照片剪下來，然後再將其背對背地貼在一起，這樣就可以試着復原出文書的原來模樣了。

爲了固定木簡以防簡片散落，也爲了使簡冊可以卷起來，最初所有的簡都是用編繩緊緊編聯在一起的，而敦煌所出土的木簡中沒有一例簡冊得到完好的保存。還好從居延出土的簡牘中有兩部簡冊保存完整。一部由 77 支簡編聯而成，包含了公元 93—95 年的記錄；另一部署爲公元前 42 年的，由三支簡構成。這些材料在說明簡冊原始的面貌方面具有極重要的價值。而除了那些成卷的完整無損的簡牘外，還存在大量不同形狀、不同長短、形制各異的簡，所以有必要考證各種形制的簡牘所要起的作用是什麼。通過簡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卷起來的簡冊上面附有題籤，以區別書卷的內容。還有一些籤牌是在傳遞過程中被添加上去的，記有送達地址以及燧卒簽收時間的信息。有少數起到路牌的作用，通關者必須用此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還有少數被稱爲檄的簡牘，具有傳送的作用，其形狀特別，一般由快馬傳遞。此外，還有的木簡有兩個契口，以使用編繩把整卷木簡編聯起來後，施加封泥，使其得以封緘。

在發現這些簡牘文書的地方，沒有有關組織和管理屯守在邊陲要塞地區的戍卒的直接知識的報告、命令或其他形式的文件，也沒有後來的任何軍事通訊的例子可以讓我們想象我們有可能會發現什麼，或者那些文書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形式。關於漢代軍隊的組織方式，在居延簡牘中同樣也找不到任何信息，祇能見於《史記》、《漢書》部分章節裏僅有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沒有涉及被征募的士兵如何集結、如何行軍到西北地區、如何使用武器進行操練以及如何駐軍防衛等具體問題。通過對於居延

漢簡的釋讀與綴合工作，漢代郵驛傳遞制度的運行、屯守於防禦綫上的駐軍利用烽火信號進行逐烽傳遞軍情的景象，以及用以檢查軍隊裝備、固定糧食衣物配給而存在的種種安排都可能重現在我們面前。居延漢簡還提到一些有關控制行人進出、修繕房屋的日常事務。有少數幾枚簡源於中央政府所發佈的皇帝詔令，其書寫字迹比起其他大多數簡文都更為規範和專業。

居延所出土的簡牘共計 1 萬多枚，其中一些帶有日期的簡排在公元前 102 年至公元 98 年之間。有一個普遍的問題確曾在京都大學居延漢簡研讀班上討論過，就是儘管商人與散客來往於敦煌的主要干道是自西向東的，漢代卻在薄弱地區建立起一道由南到北的防禦綫並派吏卒屯戍，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有關田卒（被招募來從事農業勞動的士兵）的簡文，提供了答案：南北走向的防禦綫保護了漢代政府在居延河套地區建立起的農業，以生產自西向東這條主要防禦綫上所必需的食糧。

簡文中出現了許多必須從技術層面進行考察的問題，諸如配給吏卒及其家屬穀物所使用的量制等。必須查明某些特定術語的含義，它清楚地標明了軍事設施上的專用部件，例如附置於邊塞城牆上用以安裝重型弓弩的各種裝置，以及去搞清楚區別不同弓弩強度的方法。爲了再現漢代使用的曆法，有些人做了一些嘗試，較有名的是黃伯祿(1910)、陳垣(1926)及董作賓(1960)。對簡文上所載的一些日期的研究表明，他們復原的漢代曆法有些地方需要加以訂正，例如，什麼月份應從 30 天改爲 29 天。考察一下簡文中關於日期的記載方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漢時期都是用干支來記日的，只是到了東漢時期，纔以數字來記日。

在我所有的工作中，我要特別感謝荷蘭萊頓大學的何四維(Hulsewé)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西門(Walter Simon)教授。何四維教授曾親眼見過居延簡牘的部分木簡或者照片，並很快意識到居延簡牘是研究漢代制度和行政的非常有價值的材料。在從京都大學回英國時，我給他看了我復原簡牘原貌的第一稿，現在回想起來，我都特別感激，作爲一名資深的學者，他熱情地鼓勵我繼續研究。同樣，當時倫敦大學漢學系的主任西門教授，補正了我花了一年時間的研究成果，並且鼓勵我繼續研究。

關於這些簡牘在戰爭期間如何被運出中國、並跨洋過海去華盛頓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大概 1970 年前後，我在華盛頓訪問期間，滿懷着看一看原簡的希望訪問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然而，結果讓我大失所望。這些簡都已裝進箱子並交付庫藏以便安全保護，圖書館的人員不允許以任何理由來打開箱子。然而，過了幾年以後，我非常幸運地訪問了臺北的中研院，那時存放木簡的箱子就藏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地下室裏，我有幸得到批准可以打開這些箱子查看，同時有一位研究所的人員奉命來陪我——可能害怕我會偷偷拿走一些簡。當第一個箱子被打開時，這是三十幾年來第

一次打開,我急切地想看看木簡被保護的情況,還好我發現這些簡牘在準備好的大箱子裏雖然存放了這麼久,好像也沒受到什麼損壞。

在我原來研究的過程中,我特別下功夫,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將一些殘簡綴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篇完整的簡文,而這個工作是以木簡的圖版為基礎來進行的。因此,我很高興,這時能有機會將我的結論與原簡本身作對比。這裏,監視我工作的“看守”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從北京等其他地方運來的珍寶在臺灣碼頭卸貨時,他曾受雇做搬運工。據他說,當卸貨車舉起一個挺大的箱子時,其機械部件吱吱作響,而後那個箱子就一下子掉下來摔在了地上。箱子裏面裝的是明清時期珍貴的瓷器。他還告訴我,他是如何花了幾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將瓷器的碎片拼在一起的。當他發現我在做完全相同的拼合工作時,他很清楚地示意我,哪些地方他同意我的想法,或者哪些地方我的想法是錯的。

有一天,日本學者安排了一次考察,參觀八世紀日本的都城奈良,考古發現表明那裏是宮殿群的遺址。在他們的考察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木簡的殘片,還發現了形制較小的木簡,上面寫有文字,其內容主要是關於實際事務,比如存貯穀物所必要的賬單等。那時,我們沒有看到有長篇的簡文,或者作為土地管理方式的一個部分的公文。當時在場的來自京都大學的所有學者,至少其中大多數,以前都沒有機會看到任何寫有文字的簡牘。

甘肅磨嘴子所發現的一種不同類型的簡文,極大地補充了我們所瞭解的漢代簡牘文書的構成方式。它們包括《儀禮》的若干篇章,以及一篇公元 72 年授予老人特權的文書。磨嘴子簡的圖版及釋文於 1964 年出版,講明了那些比大家熟悉的居延、敦煌簡長出一倍の木簡是如何使用於特殊目的的。從一些簡文中還可以看到,抄手從一開始就將編號添加在每支簡文的下方,從而有助於編繩散斷後的再次編聯。

此後,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有了一系列的發現,尤其豐富的是馬王堆。居延和額濟納河的“新”發現為數眾多,極大地增加了我們有關漢代制度與行政方法的知識,其中有更多的簡冊保存完整,編繩依舊編聯在卷成的簡冊上。其他地方的遺址也有豐富的簡文發現,其內容有的是曾見過的文獻,有的則是迄今大家所未知的著作。這些有價值的新發現將在今後許多年吸引中外專家從事研究。

2010 年 10 月 28 日

(魯惟一:劍橋大學,此文由程薇翻譯,邢文審校)